

《台灣學誌》第 11 期  
2015 年 4 月 頁 111-116  
DOI: 10.6242/twnica.11.6

##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書評 A Review of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陳雅湧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Weatherhead 東亞研究中心客座訪問學人

yachen.chen@yahoo.com

編者：Lydia H. Liu、Rebecca E. Karl、Dorothy Ko

書名：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出版者：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3 年 3 月

ISBN：978-0-231-16290-6 (Hardcover)

ISBN：978-0-231-16291-3 (Paperback)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一書除了開頭的簡介之外，主要是以英文翻譯何殷震（原名何班）生平六項有關於華人女性主義的論述，包含女性主義宣言、女性勞動力、女性復仇、女性解放的問題、女性主義反軍事主義、經濟革命與女性革命等等。本書末尾也以英文翻譯了梁啟超的〈論女性教育〉和金天龢的〈女界鐘〉。

在華人的性別文化史上歷朝歷代似乎至少有三個屢見不鮮、反覆出現的模式：首先，第一個模式就是每當國家遭受外族侵略或者亡朝滅族危機的時候，男性精英份子就開始拿女性性別議題開刀，彷彿充當物美價廉而且垂手可得的代罪羔羊，幫助輿論轉移注意力，迅速達到卸責的功效。比方說，唐朝法律允許女性享受到比中國許多其他朝代的女性還要更高的性別平等福利，可以無罪再婚，多位李唐公主慶祝第二或第三次婚姻都明文記載於史料之中，可是，後來飽受外族入侵之苦的宋、明兩朝男性精英份子，卻逃避己身政治軍事失敗之責，而轉向挑剔女性貞節。而第二個模式則是男性追求其政治理想的過程中，順便產生少量女性解放的副產品，譬如台灣本土男性抗日精英份子或佔據台灣的日本男性殖民主義者，為求其政治目的，必須尋求女性精英的協助配合，而難

免（或不得已）允許少部分女性識字率抬升與女性工作機會。然而，這些少量的性別改善，都只是男性精英追求其政治理想過程中的副產品而已，他們不見得就是真心追求性別平等，也不一定全心為飽受性別不等待遇的女性謀求女性解放的福利。第三個模式就是歷代華人男性中心的傳統通常樂見女性同胞享受母權，但卻比較難以接受她們享受女權。而何殷震的華人女性主義思想理論推翻上述三項常見於歷史上的模式，很值得劉禾、Rebecca Karl 和高彥頤三人以 308 頁英文合編書的篇幅詳細介紹給全世界。

由於英文中 Chinese 一字含有華人或（和）華語的意思，因此本書評認為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一詞（也就是此英文書名的中文翻譯「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一詞）不應排除萌芽生根、發展茁壯於台灣的華人女性主義如何創始建立與開枝散葉的生長過程。雖然台灣不可否認的確與中國大陸、共產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樣都俱備儒家背景和其他華人歷朝歷代以來的傳統，但是，畢竟從 17 世紀以來荷蘭、西班牙、英國、日本殖民者統治台灣之後，就已經造就出台灣迥異於中國大陸的歷史文化特質，這是台海兩岸與全球不論政治立場如何都無可置疑的史實。如果台灣華人女性主義和性別實踐整體歷史的過去、現在、未來可以受到學術界重視，而非輕易誤認、等同或過度簡化為中國大陸、共產、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年建國後的女性主義，本書評或許可以成為足以拋磚引玉的起點，希望召喚學者從台灣華人女性主義立場出發，回應《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一書。呼籲後續的學術研究多多關注台灣華人女性主義的獨特性如何迥異於中國大陸、共產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年以來的女性主義。台灣地區的華人女性主義如何誕生、如何發芽、成長於台灣的種種面向，也是屬於華人女性主義的一部分，同樣也值得全球性別研究學者的關注、欣賞、評介與理解。因為《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一書已經有一些學者從別的視角出版過書評了，所以，本書評從台灣立場發言做書評，恰好可以補足其他書評所欠缺的觀點。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官方網站開門見山、一針見血地指出：何殷震（出生年份不詳，約 1880 年代-1920）是一位彰顯華人女性主義如何誕生的理論家。根據這句話的涵義，何殷震生平思想理論中是否包含或者排除位於台灣的華人女性主義如何誕生的來龍去脈？假如「誕生」這個關鍵字隱含了華人女性主義世族家譜、血緣傳承或 DNA 的意義，那麼，《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一書的三位合編者劉禾、Rebecca Karl 和高彥頤很可能等於是扮演了歷史學家以及相當於進行人口普查的政府行政人員等等角色，記錄了華人女性主義如何誕生、如何成長的「成長故事」( bildungsroman)，並且將「出生證明」文件頒發給她們心目中的這個華人女性主義新生兒。如果何殷震果真將位於台灣的華人女性主義包含於她自己有關華人女性主義的生平思想理論內容之中，那麼，劉禾、Rebecca Karl 和高彥頤三人於此書中為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所頒發的「出生證明」是否也論及何殷震一生思想理論所涉獵的範圍不僅止於中國大陸的華人女性主義，也囊括了位於台灣

的華人女性主義如何誕生、如何發展的成長故事（*bildungsrom*）？例如，何殷震出生於1880年代，但與她差不多同時期的傑出台灣女性謝雪紅（1901-1970）、蔡阿信（1899-1990）、邱鴛鴦（1903-1995）、葉陶（1905-1970）、楊千鶴、張玉蘭、簡娥等人落實性別平等意識的生平事蹟，跟何殷震的故事同樣也是很多人都不太熟悉的華裔女性生平事蹟，卻在《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一書之中慘遭隻字未提、近乎抹煞殆盡的待遇。

除了男女異性戀議題之外，《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一書可能尚未彰顯的性別議題是非異性戀的部份。此書是否交代何殷震如何面對其他同性戀、雙性戀、變裝、變性等等議題？何殷震如何看待或評論這些非異性戀的性別議題？20世紀在台灣、中國大陸和其他華語地區的情況如何？劉禾、Rebecca Karl、高彥頤三人是否在本書開頭或結尾的章節補充何殷震未能仔細探討的此一部份呢？例如，最近台灣的民間團體和立法委員草擬多元成家法案，和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爭議，也是位於台灣的華人女性主義性別議題，根據劉禾、Rebecca Karl、高彥頤三人在《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一書中的陳述，何殷震如果知道這些性別議題在21世紀的台灣受到立法院如此熱烈關注討論，甚至遠超過中國大陸、香港、蒙古、西藏、澳門或其他華人地區的話，她會以什麼樣的態度或方式處治這些位於台灣的性別議題呢？位於台灣的華人非異性戀性別（non-heterosexuality）議題是否也算在何殷震當年考量華人女性主義如何誕生、如何發展的範圍內呢？

何殷震本人與夫婿劉師培就在1910年生產一女，幾個月後女兒夭折，不過何殷震主要的女性主義論述都撰寫於她誕生此女之前。假若「誕生」這個詞語，在《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這本書中，果真是無法迴避的隱喻性關鍵字，那麼，生物、醫學與性學研究（sexology）層面的概念絕對也無可避諱。尤其性別研究本來就是跨學科研究，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全球知名的金賽性別研究中心（Alfred Kinsey Institute of Sexology）恰好就位於取名為Good Body Hall隔壁的建築裡頭，所以，本書評為平衡人文社會、法律歷史與自然科學等跨學科的解讀與研究方法，特別在此一段落強調生物、醫學與性學層面相關的部份。無論是華人女性主義這個擬人化的新生兒或者是何殷震本人，想必一定有其父母、祖父母、祖先和親戚共享祖祖輩輩、世世代代相似或相同的華人女性主義血統與DNA。誰是這個華人女性主義新生兒的親生父母呢？誰是爺爺奶奶？誰是祖先和親戚？歷朝歷代以來曾意圖與男性君主一樣稱王稱霸於朝廷的女性，例如：呂雉、武則天、劉娥、慈禧太后等人，她們算是華人女性主義這個新生兒遠在古代王朝的曾祖輩太姨婆嗎？史前母系社會領導人是否視為華人女性主義寶寶的母系祖先？誰的卵子、誰的子宮、誰的精蟲一起孕育此一華人女性主義胚胎、生產出此一華人女性主義幼兒？誰是生母？誰是孕母？誰是生父？哪位婦產科醫師、助產士、麻醉師或護理師接生了這個華人女性主義寶寶？出生於哪一家醫院或診所？出生地在華語地區境內的哪個地方？自然受孕、人工受孕還是試管嬰兒？母體陰道自然分娩還是剖腹生產？生辰八字是哪一年、什

麼生肖、哪個月、哪一天、星期幾、什麼時辰呢？產前陣痛多久？生產時間多長？新生兒的性別是女性或男性，是否因華人重男輕女的傳統，而帶給生母或孕母在產後期間憂鬱或愉悅的情緒呢？生母或孕母的產檢、育嬰待育如何對比現今華人職業婦女在台灣或其他華語地區的給假、給薪待遇？產後母體保養是否依照華人傳統？還是類似西方傳統毫無所謂「坐月子」的習俗呢？21 世紀的醫學研究顯示，胎兒早在母體子宮之內，就已經能聽到媽媽的心跳和說話的聲音，甚至能聽到母親所說的官方語言和方言的音調有什麼區別，所以，華人女性主義這個新生兒是否也在胚胎時期就已經連續九個月在子宮內聆聽媽媽的性別議題論述了呢？這算是華人女性主義的胎教嗎？此外，21 世紀的醫學研究也顯示，新生兒以母乳哺育遠比其他哺育方式更能增強生理與免疫機能，那麼，這位華人女性主義的新生兒是由哪位女性哺乳而成長？還是以其他非母乳的方式哺育？這名擬人化之後的華人女性主義嬰兒長大之後是否成為異性戀女性與男子結婚繁衍後代（是否未曾顯示女同性戀、雙性戀、變裝、變性等傾向？），然後生養出任何華人女性主義後代，比方說像是謝雪紅、宋美齡、江青、李元貞、呂秀蓮、李銀河、王政，甚至是《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一書的兩位華裔合編者劉禾和高彥頤？這些的華裔女性的男性伴侶，比如何殷震的夫婿劉師培、謝雪紅的戀人、宋美齡的丈夫蔣介石，或江青的前後多任丈夫，在這個華人女性主義的世襲族譜與親屬脈絡中扮演何種角色？支持性別平等的其他男性，好比 1901 年曾下令禁止華人婦女纏足的滿清光緒皇帝、中國大陸地區民國時期的性博士（Dr. Sex）張競生（1888-1970），還有建立了中國大陸地區第一家性學博物館的劉達臨（1932-），不論出生於劉禾、Rebecca Karl 和高彥頤出版《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一書、指出華人女性主義的族譜之前或之後，他們所扮演的又是什麼樣的角色呢？

不管是何殷震生平的年代，或者即使是 21 世紀的今天，一個嬰兒的誕生，無論是醫療技術層面，或者是倫理道德層面，都不可能是單獨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任務。要順利誕生一位新生兒，不管是陰道自然分娩還是剖腹產，都需要提供精卵的生父生母、子宮功能完善的孕母、醫生、護士、麻醉師等等很多人通力合作。同理可證，何殷震是否單獨僅靠她自己一人獨自的力量就生出了華人女性主義呢？類似的考量也出現在其他的學術出版品的記錄史之中，譬如：陳芳明為他的著作取名為《謝雪紅評傳》，而非《台灣共產女性主義的誕生》，他如此決定此書標題的方式恰巧配合上述有關台灣共產女性主義如何誕生、如何發展、謝雪紅是否真的只靠她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就生出了台灣共產女性主義的顧慮。即使像是謬伯英（1899-1929）、王會悟（1898-1993）、劉清揚（1894-1977）和向警予（1895-1928）等等中國大陸最早的女共產黨員，也沒有人將他們的生平故事命名為中國共產女性主義的誕生，這也正好呼應了上述的顧慮。從台灣立場回應《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一書，本書評主張，不管什麼地區的女性主義（包含台灣地區或中國大陸地區的華人女性主義）都是許多人同心協力、眾志成城，而且經過長時間耐心的醞釀與經營，才能完成艱鉅的任務，促成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的誕生、進步和成長。而且，

華人女性主義誕生的確切時間，或許還不一定就是如同醫院接生嬰兒那樣可以明確固定記錄新生兒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星期幾的幾點幾分幾秒，因為研究人員可能隨時發掘出比現今人們眾所周知最早誕生的華人女性主義還要更古早的事蹟。本書評因此刻意為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時刻」留下一個開放性的結局，避免以蓋棺論定的姿態明文確定目前已知有關於華人女性主義是否就真的誕生於何殷震之時，目的就是要一直保持不確定性才能永遠迎接和擁抱更新的發現，說不定三年、八年、四十年、一兩個世紀之後可能就有其他學者發現比何殷震更早的人也直接、間接地催生了更早的華人女性主義。

《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可能誘發讀者想起另外兩本書：哈佛大學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 *Engendering China*《中國性別 / 誕生》、加州大學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的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華人革命的性別 / 誕生》。不過，這兩本書並未談到台灣地區華人女性主義的元素；因此，本書評或可充當這兩本書的台灣補充版本，為上述兩本書補充台灣立場的心聲。例如：本書評觸及謝雪紅的台灣共產女性主義社會運動，這部分可能提醒讀者回想起 Kelly Gilmartin 在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華人革命的性別 / 誕生》一書中，意圖強調中共女性主義而論及王會悟、向警予，但可惜卻漏掉了謝雪紅，所以，本書評重複提到台灣共產女性主義先鋒謝雪紅，也等於間接幫助《華人革命的性別 / 誕生》一書彌補了遺漏謝雪紅的這個遺珠之憾，同時也協助補強讀者針對於華人女性主義的全面性理解。

雖然英語地區不瞭解亞洲的人可能因為台灣 (Taiwan) 與泰國 (Thailand) 的英文發音類似而常常將台灣誤以為是泰國，不過，台灣情勢如何發展的議題早已經以主角的超大重量級份量入主各種有關台灣政治外交史或經濟史研究的學術書籍，比方說 William Campbell 的 *Formosa under the Dutch*、Tonio Andrade 的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Melissa Brown 的 *Is Taiwan Chinese?*、Alan M. Watchman 的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Denny Roy 的 *Taiwan: A Political History*、Bruce Herschensohn 的 *Taiwan: The Threatened Democracy*、John Franklin Copper 的 *Taiwan: Nation-State or Province?* 或者 Murray A. Rubinstein 的 *Taiwan: A New History* 等書。然而，有關於台灣性別研究的英文學術書籍至今寥寥無幾、屈指可數。最重大的原因在於現今大多數以英文為母語的性別研究學者雖然不至於將台灣誤以為是泰國，但卻常常誤將台灣性別議題過度簡化並歸類於共產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年以後女性性別研究的大框架或大傘之下。以哈佛大學圖書館目前的網路書目為例，除了少數例外（像是 Cal Clark、Janet Clark 夫婦與周碧娥合作的 *Women in Taiwan Politics*、Catherine Farris 聯合 Murray A. Rubinstein 與李安如合作的 *Women in the New Taiwan*、陳佩瑛的 *Acting "Otherwise"*、Lydia Kung 的 *Factory Women in Taiwan*、Doris T. Chang 的 *Women'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Taiwan*、Hans Tao-ming Huang 的 *Queer Politics and Sexuality Modernity in Taiwan* 以及陳雅濱出版過的

幾本書)，大多數英文學術書只是因為主要論述中國大陸地區華人女性主義的大輪廓而順便稍微提到台灣地區華人女性主義的少部分訊息，並未將台灣的華人女性主義當成它們唯一真正關切的焦點。也就是說，目前牽涉華人女性主義的大多數英文學術出版品都是如同《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一書，彷彿閩南語諺語所謂的「西瓜靠大邊」心態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缺乏台灣立場發聲，誤以為中國大陸地區華人女性主義足以全面性代表台灣地區華人女性主義。此一 big China bias（大中國偏見）的無心之過，或多或少阻礙了讀者深入理解台灣地區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成長，以及其過去、現在與未來均迥異於中國大陸地區華人女性主義的獨特發展史。